

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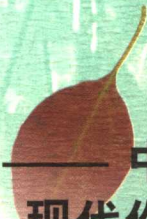
杨剑龙著

野

的

呼

声



中国
现代作家
与基督教
文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L206.6/216



杨剑龙著

—— 中国
现代作家
与基督教
文化

旷野的呼声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国家文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点项目

旷野的呼声

——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

杨 剑 龙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218,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6015-2/G·6170 定价: (特精) 20.00 元

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

(代序)

陈思和

在读杨剑龙先生的新作《旷野的呼声》之前，我读过一本美国学者罗宾逊写的关于中国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书，书名叫《两刃之剑》，取的意思是《圣经》里“旷野的诱惑”的传说，即基督与旷野中的魔鬼的对话，展示了人的崇高和阴影——基督品性与魔鬼品性——之间直率的对话。那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对基督教的批评时，发现这些反基督教的言论出现的同时，或者说其批判的真正目的，中国作家们仍然在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展开揭露和检讨。所以“两刃剑”的意象就成为中国作家对基督教文化所采取的某种思路——他们在向基督教会宣战时运用两刃剑的结果是：不仅使基督教，而且也使自己一起受到了“伤害”。我读的是台湾业强版的中译本，我不知道“伤害”这个词是否用得准确，依我的想法，似乎用“批判”或者“剖析”可能更准确一些。这位美国学者也许是想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反基督教传统与以前的反基督教传统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旧式士大夫反基督教文化出于卫道的热情，而现代知识分子却在反对基督教（主要是批判基督教会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也放弃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仍然坚持对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处境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一

个例子，这位美国学者对茅盾在 40 年代借古讽今的几篇宗教小说深感兴趣，认为这是发挥“两刃之剑”的最好故事。

由于着眼中国作家对基督教文化“反”的一面的研究，《两刃之剑》里探讨的中国作家多是既批判基督教又对中国现实抱有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郁达夫、郭沫若、许地山、冰心、茅盾、鲁迅、胡也频、欧阳山、老舍、萧乾、李健吾和巴金，其中出现两次讨论的是茅盾和许地山。这些作家或多或少与基督教发生过一些接触，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会无一不抱讽刺的态度，但与中国现实或者中国文化传统的压力相比，他们更加着力反对的是后者。这种立场也许包含了“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特点：他们把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分作两面：即作为学术和人格层面上的基督精神和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基督教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成为这种立场的象征：他曾一面呼吁要把“耶稣的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一面又参与了共产党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为的是在实际生活里打击基督教会的势力。但这位美国学者似乎没有进一步探究：这种立场还来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远背景，以启蒙为特征的反传统文化运动认同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传统对基督教文化所采取的复杂态度。就如陈独秀说的：“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

在“五四”启蒙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很难从西方文化里完全剔除基督教文化的阴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认同基督精神，这是由中国特定的现代文化背景所决定。这是两者“同”的一面，《两刃之剑》所没有深入探讨的，被杨剑龙先生接过来认真地阐发了，剑龙先生的书名为《旷野的呼声》，他取意为《新约·马太福音》的约翰布道故事，引申为：“中国现代作家们在从事的

启蒙运动中,常常会有一种身处旷野之感,那种呼唤民众的觉醒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孤寂之感,那种为民众而献身不为民众所理解的落寞之感,那种欲和敌手对垒却陷入无物之阵的无奈之感,这在鲁迅的作品里尤为生动: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的‘这样的战士’,沉酣于大欢喜大悲悯中的‘人之子’,赤裸地站立在无边的荒野上说出无词的言语的‘垂老的女人’等,都托出了鲁迅内心深处深沉的旷野之感。这种感觉在诸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很显然,剑龙先生着眼点不在中国作家如何反对基督教,而是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认同”基督教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在自己身上的文化传统因子里发现基督精神的无所不在。如书中把中国作家所推崇的牺牲自我拯救世人的道德品质与耶稣的“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直接联系在一起,把这种人格追求现象归结为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作家的正面影响。我不知道在中国作家的人格提升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在某种关键性的历史时刻,这样的结果是被呈现出来的。可以举一些抗战时期的例子,如一向坚持无神论和人道主义的巴金在返回上海孤岛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发扬圣彼得“重进罗马”的精神。这是来自波兰作家显克维支的小说《你往何处去》中的一个故事,当罗马暴君尼禄屠杀基督徒的时候,圣彼得逃出了罗马城,在半途上遇到基督显灵,指示他要到受难的人民当中去。圣彼得重进罗马,结果被暴君钉死在十字架上。巴金并不相信基督教,但他对基督教有好感,曾多次引用《圣经》里的话来表达为信仰而死的意思,在抗战的背景下,他又一次引用了这个故事,这不能仅仅看作是他想利用宗教故事来唤起民众抗日的决心,在他自己从后方踏进沦陷区包围下的孤岛时,宗教故事也成为他对自己人格的一种自我激励。还有一件事,是上海沦陷期间从事中共地下党委工作的丁景唐在编辑进步学生刊物《联声》时,

就创作过一首关于耶稣受难题材的长诗《一个以色列民族英雄的死》，来透露皖南事变以后的悲愤心情。也不能说这里没有利用宗教题材合法性的意思，但耶稣受难故事本身的感动性在这时引起的精神共鸣，说明了基督教与人格自我磨砺的暗合的可能性。这两个故事都是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发生的，难免有点实用主义的效应，而如本书所展示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对基督精神的认同，似乎更加值得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人所注意的。

由于着眼点不同，剑龙先生在《旷野的呼声》中选择的研究对象也很不相同，他分专题研究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苏雪林、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曹禺、徐訏、北村、张晓风等十五个作家，除了当代作家北村和台湾作家张晓风以外，其他十三位与《两刃之剑》所讨论的十二位现代作家作一比较也是很有趣的。两者重复研究的作家是七位，《两刃之剑》独有的作家是五位：郁达夫、茅盾、胡也频、欧阳山、李健吾——绝大多数是对宗教仅仅抱讽刺态度的作家；而《旷野的呼声》独有的作家是六位：周作人、庐隐、苏雪林、张资平、曹禺、徐訏——大多数是对宗教抱有理解和认同的作家，所以，剑龙先生对这个课题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不仅对那些独有的作家的研究，即使是两本书共同研究的作家，他们的着眼点也是不一样的，剑龙先生似乎更加注重他们所受到的基督教的正面影响。

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似乎暗示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所变化。那位美国学者研究这个课题是在80年代初，当时学术界还保留着浓厚的所谓“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过去十几年里由于反西方文化的力量制约，基督教文化处于被否定的状态下，无法得到意识形态范围的正面肯定，这只要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围剿和批判中可以体会得到。所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内涉及这

个课题,也只能片面强调反基督教的作品。那位美国学者虽然敏感地抓住了这些反基督教的作品里同时包含了对自身文化环境的批判,但仍然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假象的迷惑。如他在1980年写信征求老作家萧乾意见时称萧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作家”,而萧乾在回信中则纠正了他的看法,萧乾强调“随着年龄及阅历的增长,自然我也接触到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基督教,我很喜欢,甚至醉心,我看到了基督教另外的一面”,并正确地说明了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与殖民主义强权一起传进中国的方式及其被利用为文化侵略工具的性质。这些说法在8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很犯忌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北村的小说创作的出现就很具体地说明了这种不可忽视的变化,剑龙先生显然是抓住了当代文化的信息,在《两刃之剑》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探索,换句话说,他仍然在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作家的具体影响,杨剑龙先生在书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这里不必饶舌。但我还想对剑龙先生的“旷野的呼声”意象作点小小的发挥。这个意象虽然来自《圣经》,但剑龙先生对它的解释,似乎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基督教的含义,把它比作是中国启蒙主义者精神的象征。正如上文所引的“旷野之感”“孤寂之感”“落寞之感”和“无奈之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所必然会产生心理体验,也是中国古典文化向现代转型时期所必然会发生心理体验,它的产生本无须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催化。虽然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感受到的献身者的寂寞,与他所接受的基督献身精神会产生出共鸣,但两者毕竟是二元的,并非一定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何妨我们将剑龙先生所描绘的“旷野的呼声”视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现象,并以西方的“旷野的呼声”为世界性的文化参照,研究一下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如何产生出类似基督教文化的“旷野的呼声”?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诸如“忤

悔”“救赎”“献身”“信仰”等世界性的文化命题，都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作为整体性的世界文化的一分子，它不仅仅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产生出与西方文化所相类的感受，这本身又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涵。所以，当并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作家们会在作品里出现了与基督教文化相似的精神现象，这不是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了研究这个课题的可能吗？由此看去，关于中国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穷尽，不知剑龙先生在剖析了具体作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现象以后，还有没有进一步开掘的兴趣和决心？

是为序。

1997 年 12 月 12 日于黑水斋

前 言

文化是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面貌，文化也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它推动着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生发展中必然会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在不同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宗教成了历史文化的载体，宗教的传播会起到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的效果。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印度文化中深奥玄妙的佛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与深刻的影响。基督教自唐朝太宗年间传入我国，虽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与佛教文化的抵牾中时乖运蹇，未能形成如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局面，但经唐、元、明清三次传教高潮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以儒家的学说阐释基督教教义，以西方科学的传播为传教的手段，必然给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带来影响。

一种外来文化的渗入必然以对本土文化的适应为前提，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在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依附中逐渐与之结合，几乎成为中国的国教。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虽然一些传教士努力以儒释教，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观、伦理观方面发生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基督教对中国祭祖祀孔的反对，尤其引起人们的反感，使中国士大夫们对基督教有着一一种深刻的不满和抗拒。“五四”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化，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作家们与基督教文化有着一一种

十分特殊的关系，他们中有的受到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有的曾经皈依过基督，有的出国留学在异国浓郁的基督教文化环境中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有的在《圣经》和西方文学作品中接受了基督教的某些思想。从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到冰心、庐隐、苏雪林；从张资平、郭沫若、老舍，到萧乾、巴金、曹禺，直至徐訏、北村、张晓风，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创作中，无论是题材的择取。作品的构思，还是艺术手法的采用、《圣经》典故的运用，都无不沁出浓郁的基督教色彩。本书选取了如上 15 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别梳理他们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分析研究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深刻影响。诸如鲁迅推崇基督的充满着爱与牺牲的救世精神；周作人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人道主义的精髓；许地山关注人性在受窘压的状态下的挣扎；冰心充满了基督的博爱精神；庐隐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形成其创作的感伤风格和悲剧色彩；苏雪林为耶稣伟大的人格所感化，细致地描绘人物对基督的皈依历程；而张资平努力揭露神职人员的“一面教人认罪，一面背着人作恶”；萧乾全力针砭教会中“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赛人”；老舍则在揭露牧师教徒的虚伪卑劣时，还塑造了具有基督牺牲精神的理想人物；……如此种种，使这些作家的创作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风采。

德国神学家 K·J·库舍尔在谈及当代作家与宗教的对话时说：“它们要打开对宗教感兴趣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独创性的语言练习、创造性的想象和勇于反省的绿洲。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对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它们则可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被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那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神学

与当代文艺思想》第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出版。)库舍尔认为在文学的领域可以发现为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的绿洲,宗教是文学创作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本书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奢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去发现、开拓出一块“绿洲”,期望有新的发现和建树。与西方作家相比,中国现代作家没有西方作家所生活于其中的浓郁的基督教文化环境,他们虽然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其中大多数人可以说并没有达到西方作家那种深入骨髓、刻骨铭心的地步。由于自小生长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大多是有选择、有目的的。他们大多在对基督教的历史与文化有所批判的前提下,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之作为拯救民族与国家的良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大多借助于种种不平等条约,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文化也带着一种鲜明的怀疑精神和批判色彩,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不少作品揭露了基督教教会的种种阴暗面,针砭了一些传教士的虚伪卑劣的性格与作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宗教的。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的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消除虚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9页。)中国现代作家身处“五四”之后这个民族危难和焦虑的时代,“立人”的问题处于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对人的个性的张扬与推崇,对人道精神的崇仰与倡导,对不幸人们的关爱和怜悯,对麻木灵魂的启蒙和呼唤,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关注的焦点。他们从基督教文化中看到的大都是“人的内容”,而不是“神的内容”,往往不关注基督教文化中的神性,而瞩目于其中的人性,他们常常以一颗充满博爱之心,描绘种种不幸的人生,以一双充满温情的眼睛,讴歌种种温馨的生活,以一种执著的信念,

探讨人类生存的真谛,甚至他们对基督也同样看重他的人格,而忽略他的神性。

本书着重从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客观辩证地考察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或抵御,努力从他们的创作中寻觅探析基督教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第一手资料,通过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研究基督教文化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并努力从文学的视角研析《圣经》文本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具体影响。本书涉及文化学、宗教学、比较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期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某些方面的空白。

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中写道:“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称那些掌权者为“毒蛇的种类”,他对群众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要这样作。”他在旷野上疾呼人们悔过自新,改邪归正,但他的主张并不为人们所接受。中国现代作家在启蒙运动中,常常会有一种身处旷野之感,那种呼唤民众的觉醒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孤寂之感,那种为民众而献身却不为人们所理解的落寞之感,那种欲和敌手对垒却陷入无物之阵的无奈之感,这在鲁迅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生动: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的“这样的战士”,沉酣于大欢喜大悲悯中的“人之子”,赤裸地站立在无边的荒野上说出无词的言语的“垂老的女人”等,都托出了鲁迅深沉的旷野之感,这种感觉在诸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基于此,本书借用《圣经》中“旷野的呼声”为书名。

收在本书的附录中的《论“五四”小说中的基督精神》,刊于《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85年1月—1993年12月)优秀成果奖。《“五四”小说中的基督教色彩》在1993年4月号的《二十一世纪》刊出,后为德国出版的《中国教讯》

前 言

1993 年 4~5 期译为德文全文转载。这两篇文章与论题相关,故附录于后。

杨剑龙

1998 年 7 月记于瞻雨斋

目 录

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代序)	陈思和 前言
---------------------------	-----------

第一章 引论：“彼岸之神的幻影”	(1)
------------------------	-------

第一节 “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	(1)
--------------------------	-------

第二节 “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	(5)
--------------------------	-------

第三节 “我们应该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 ..	(10)
----------------------------	--------

第四节 “须知基督教在文学中永远占着重要位置” ..	(14)
----------------------------	--------

第二章 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 门”	(20)
---------------------------------------	--------

第一节 “他的信仰是在哲学，不是在宗教”	(20)
----------------------------	--------

第二节 “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看”	(25)
----------------------------	--------

第三节 “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29)
-----------------------------	--------

第三章 周作人：“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 个人”	(35)
--	--------

第一节 “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 很适宜的”	(36)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 从基督教精神出来”	(40)
--	--------

第三节 “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 放与性的解放”	(44)
--	--------

第四节	“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	(48)
第四章	许地山：“宗教当使人对于社会、个人，负归善、 精进的责任”	(53)
第一节	“育于神学宗教学的熏染中”.....	(53)
第二节	“只求当时底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	(58)
第三节	“人性在受窘压底状态下怎样挣扎”.....	(64)
第四节	“以寓言和象征启迪我们的爱、信、勇气 和智慧”	(67)
第五章	冰心：“永远在你座前作圣洁的女儿”	(73)
第一节	“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74)
第二节	“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	(77)
第三节	“避开悲愤，成为十分温柔的调子了”	(80)
第四节	“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	(83)
第六章	庐隐：“上帝赐与了她悲观的分子”	(87)
第一节	“我这空虚的心，在这时便接受了上帝”	(88)
第二节	“不如暂且将此心寄托于宗教”.....	(90)
第三节	“真了解悲哀才有与神接近的机会”.....	(95)
第七章	苏雪林：“基督教的神却是活泼，无尽慈祥，无 穷宽大”	(102)
第一节	“要信便信你的天主教”.....	(102)
第二节	“是为耶稣伟大的人格所感化”.....	(105)
第三节	“母亲的爱，是这样救了我”	(109)
第八章	张资平：“是我们要求宗教，宗教不能要求我 们”	(115)
第一节	“一面教人认罪，一面背着人作恶”	(116)
第二节	“上帝赦免了他从前一切的罪过”.....	(122)
第三节	“做神的仆人可以，做教会的奴隶就错	

了”	(126)
第九章 郭沫若：“我们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	(133)
第一节 “我还要陪你再钉一次十字架”	(133)
第二节 “忏悔着现在，又追怀着过往”	(138)
第三节 “我是在十字架上受着磔刑”	(142)
第十章 老舍：“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	(146)
第一节 “我们要做耶稣生前的约翰”	(146)
第二节 “他入洋教根本不是为信仰什么”	(150)
第三节 “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156)
第十一章 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162)
第一节 “怎么‘开导’我也没信教”	(162)
第二节 “我看的是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赛人”	(165)
第三节 “开始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	(169)
第十二章 巴金：“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	(172)
第一节 “基督教和基督本人吸引他，让他感兴趣”	(173)
第二节 “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	(178)
第三节 “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	(182)
第十三章 曹禺：“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 找出一条路来”	(186)
第一节 “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187)
第二节 “什么佛教，什么天主教，从宗教里寻找 寄托”	(190)
第三节 “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	(195)
第四节 “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198)
第十四章 徐许：“一切的宗教都是人的归宿”	(204)
第一节 “一瞬间，我相信了神，相信了上帝”	(206)
第二节 “慈爱的上帝，收留这个不平衡的灵魂”	(209)